

翻译的距离：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模式与实践^{*1}

肖唐金 肖志鹏

【摘要】：翻译的距离涉及文本、时间、身份、文化、审美等诸多方面，对于人格、情感、逻辑三个修辞因素的运用有较大影响，进而影响译者主体性和译文语篇意识形态的构建，译文的语篇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文章拟在翻译的距离这一视角下构建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模式，探索其实践。

【关键词】：翻译的距离；修辞；译者主体性；语篇意识形态；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 -6644(2017) 03 -0001 -16

一、翻译的距离

孙艺风^[1]提出了翻译的距离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涉及文本、时间、身份、文化、审美、操控距离。应该说，这是对信、达、雅原则的拓展。文本距离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距，这与讹错、不可译性等有关。时间距离是由原文与译文出现的时间先后造成的，一般来讲，原文出现要早于译文，时间差距越大，译文处理难度越大（如古英语诗词翻译成汉语难度就较大）。身份距离指译者与原作者的文化、政治身份与立场角度的差异，会造成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文化距离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文化差异，这会造成译文与原文的差异。审美距离与两方面有关，其一译者与原作者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差异，其二译者对原文语境的理解差异造成的译文与原文审美差异。操控距离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美学、心理等因素有关，这种距离的把握会影响翻译行为的定位和视觉效果。

翻译的距离表现的是译者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语篇意识形态（discourse ideology）。我曾经探讨过语篇意识形态这一话题，并将其运用到民族文化汉译英实践之中^[2]。语篇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时代性、领域性、语篇类型性，可由敬重、亲和、等级等关系来加以体现。译者如何处理原文，如何看待译文与原文读者、译文读者的关系决定了其语篇意识形态，这与孙先生所探讨的翻译距离有密切关系。在修辞研究中，人格（ethos）、情感（pathos）、逻辑（logos）是重要的三要素，该三要素可丰富语篇意识形态的组成，也可拓展翻译的距离这一概念。

人格包括性格、性情、道德本质，是民族、群体、意识形态的指引性信念、标准与理想或精神，通过提升或确保作者或说话者在读者或听众眼中的可信度与接受度来加以体现。情感指作者或说话者在读者或听众中所激发的情感，通过情感呼吁（如愤怒、雄心、激动等）来加以体现。逻辑与言语组织、推理、假设等有关，希望传递相关意图。由此看来，修辞三要素的运用情况与语篇意识形态有关。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人格与情感的运用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则有可能造就亲和关系；如果强调逻辑，降低人格与情感的份量，则有可能造就中立（neutralizing）态度这一语篇意识形态。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修辞要素的运用

¹ *2014 年贵州省重点教改项目“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汉互译教学模式与实践”；2014 年贵州省专业综合改革项目“贵州民族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15 年贵州省级卓越人才项目“多彩贵州英语传播卓越人才培养项目”。

作者肖唐金，男，汉族，江西泰和人，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贵州贵阳 550025）；肖志鹏，男，汉族，江西泰和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俗学 2016 级硕士研究生（贵州贵阳 550025）。

可体现翻译的距离。在翻译过程中，人格与情感的运用可体现身份、文化、审美、操控距离，而逻辑的运用往往与文本、时间距离有关。

修辞三要素与评价系统吻合。评价系统 (Appraisal Theory) 是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Martin 在 20 世纪末提出的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概念、人际、语篇功能中偏向于人际功能。该理论首先由国内学者王振华于 2001 年介绍到中国，成为语篇分析常用的工具。评价系统由三方面构成：介入 (engagement)、态度 (attitude) 和级差 (graduation)。介入可能来源于自言或他言，即个人观点或他人观点。态度由情感 (affect)、判断 (judgment) 和鉴赏 (appreciation) 组成。情感是话语参与者的感情投入；判断是话语参与者对自己或他人或相关事件的态度定位；鉴赏是对话语参与者或相关事件的属性理解，如复杂性、影响性、价值性；级差可从力量和焦点两方面考虑，前者可体现为强势或弱势，后者可体现为强化或弱化。情感系统为整个态度系统的中心，由它导出判断系统和鉴赏系统。判断系统属伦理范畴，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在新闻媒体语言的研究方面，评价系统分为两部分——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社会评价分为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正面含义让人们羡慕，负面含义理应受到批评，但批评并不是法律意义上，被批评的行为不算是恶行；社会约束也分正面与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是严重的。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做事才干、坚忍不拔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行为是否正当有关。鉴赏系统属美学范畴，指对文本/过程及现象的评价，同样有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该系统围绕三个方面形成，即反应 (reaction)、构成 (composition) 和价值 (valuation)。反应有两个方面：影响与质量。影响指文本/过程吸引力的程度；质量指文本/过程对感情有多大影响力。构成也有两个方面：平衡与细节。平衡指文本/过程是否相称；细节指文本/过程是否因复杂而影响无法理解。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文本/过程时，判断文本/过程是否重要，是否有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评价系统将修辞的三要素体现得淋漓尽致，可彰显语篇的意识形态、翻译的距离。介入与人格修辞要素对应，要获得读者或听众的信任，就必须诉诸观点，有时候名人的话或大众认可的观点就能确立发话者的可信度。态度与人格、情感、逻辑三要素都有关系。态度定位自然与可信度挂钩，其下的判断子系统与情感、人格两修辞要素相关，也与逻辑密不可分。鉴赏与逻辑这一修辞要素重叠，适当的逻辑，才能生成出合适的鉴赏。极差与情感修辞要素对应，情感的强弱既是一种修辞表现，也是评价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综上所述，修辞三要素使用的程度可体现评价手段的效果，说明发话者有意识地构建语篇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这种修辞要素的使用可表现翻译的距离，即是近距离、中距离，还是远距离。近距离也许说明译者从弘扬的角度（即“共同场”）推介源语语篇内容，中距离则有可能意味着译者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而远距离或许指向译者对源语语篇内容的负面态度。

二、翻译的距离与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实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各民族和睦相处。在今天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的社会背景下，宣传贵州多彩的民族文化无疑可提升贵州文化的软实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鉴于翻译是一种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路径，译者必须把握好理论框架与实际操作技巧，维护与促进贵州文化的正能量。

从理论框架来看，本理论有以下假设：(1) 贵州本土文化的英汉翻译是外国学者、媒体以英语作为媒介，将对贵州的研究与报道转化为汉语，为中国学者、读者、政府管理了解外界对贵州的看法提供一个窗口，因此应将这些声音合理恰当地反映出来。(2) 外国学者、媒体对贵州本土文化的研究和报道可能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鉴于译者的政治敏锐性与责任，译者应多选择正面文本，负面文本不能违背政治原则，有损国家形象。这体现了评价态度、介入、级差子系统的选择。(3) 编译贵州本土文化研究与报道应注重文本的意识形态与读者受益程度，这点与 Nord 的翻译目的论 (the Skopos Theory) 不谋而合。应在功能等值、忠实的基础上强调译者的自主性、灵活性、创造性、为客户服务性等方面。

在翻译理论方面，Heavey^[3] 提出了“释意” (paraphrase) 方法，强调翻译过程需重视文本的意识与受益程度，主张采取中间道路，即译本介乎于“元表达” (metaphrase) (近似字面翻译) 与“模仿” (imitation) (偏离原文) 两个极端之间。该理论为编译 (edited translation) 或译介 (gist translation) 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译者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在基本不

违背原文思想的情况下,译者可结合修辞三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彰显翻译的距离,体现译文的语篇意识形态,处理好与译文读者的关系。Chesterman^[4]提出了翻译模因论(memes of translation),认为翻译可有一定的模式,可在翻译实践中传承下去。Chesterman的模因不是简单的模仿,与Heavey的“模仿”不同。模因论涉及五大超级模因(supermemes),即:源语—目标语文本、等值、不可译性、意译—直译、写作即翻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模因涉及词汇、修辞、逻辑、交际、目标、认知等方面。诗歌、广告、法律文本等语体的翻译无不基于一定的模式,创新必须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从过去到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在编译或译介时应注意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操作。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研究可依以下顺序进行:语篇意识形态—语类结构—词汇语法模式,也可依以下顺序进行:词汇语法模式—语类结构—意识形态,甚至可两者相结合。从微观的角度看,凸显语类特征的词汇语法模式、语类混合的词汇语法特征、词汇的可译性、信息组织模式、语言的族群性、多模态特征应用等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据此,我们可以将与翻译距离有关的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汉翻译模式检验清单列举如下:

(1) 缩短译者与文本的距离,将英文文本置于中国历史语境中加以考虑,突出维护贵州正面形象的语篇意识形态。

(2) 克服时间障碍,构建语篇作者、译者与受话者(读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性、互文性。

(3) 充分考虑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差异,从批判角度接受其作品内容,客观地、历时性地反映贵州本土文化的状况。

(4) 鉴于原作者身份、审美观、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介绍贵州本土文化方面未免有不妥之处,译者要在译文语篇构建过程中指出这些瑕疵,正确引导译文读者或听众。

以上四个清单是检验翻译的距离运用的标准,也是衡量修辞三要素使用状况的尺码。在具体语言表现方面,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例如,在某些译文中,有多少处需要注释,注释出处怎样才合理。再如,语类结构可否加以改变——记叙事改为记叙+诗歌类型,以突显译文的吸引力、创新型。Slingerland^[5]在翻译《论语》时运用了“序言+译文+解释”模式,在具体翻译某些重要概念时,方法独特。如,在翻译“学”这一儒家理念时,Slingerland采用了“英文+括弧(拼音+汉字)”。这一翻译模式可同时拉近源语、目标语读者,不至于疏远其中一方。可以说,翻译距离得到了充分考虑。另外,修辞三元素、评价因素也得到了考虑。在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汉翻译实践中,我们不妨创建某种翻译模式,作为模因加以推广。下文我们将从实际的翻译中讨论上述模式的应用。

三、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实践

(一)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色的中央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制度。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一直高度关注,其中不乏贬低之词。田建明认为,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某种程度也一直为本国民族问题所困,但这些国家的媒体却选择集体失语或轻描淡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客、媒体频繁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对我国发难,疆独、藏独、台独、法轮功等势力,也加紧相互勾连,妄图以此抹黑我国国际形象。显然,在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做好涉及民族问题对外宣传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入思考,有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②这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量,是语篇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治理大多注重民族融合性与特色性相结合,既注重国家政权与领土的统一性,又不失给予地方文化与制度适度的自主性,土司制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

² ① 资料来源: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13123339-1.htm>。

景下产生的。

我们看一下下列对中国土司制度的描写与汉语译文：

To manage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frontier areas, the Chinese generally resorted to indirect rule. Regions of great strategic or economic value were governed directly by regular Chinese officials, while peripheral frontier regions in the southwest were ruled through tusi or native chieftains. Although policy varied considerably over time and was interspersed with periods of active conquest followed by the imposition of direct rule, it generally represented an effort to keep the marches pacified with as little effort and expense as possible. The policy was one variant of the venerable and hallowed practice of “using barbarians to rule barbarians” (yiyi zhiyi). The tusi system developed from the “loose rein” (jimi) policy of earlier dynasties. The idea behind the loose rein policy was to exert some control over chieftains on the fringes of the Chinese empire without forcing the issu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chieftains would grow intransigent and cut off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Han dynasty, relations with border chiefs under this policy were sporadic; by the Tang dynasty they had grown more formalized and regular. Gradually, prefectures, districts, and garrisons “under a loose rein” were created, and the heads of these new administrative units—largely indigenous non-Han—were allowed considerable latitude in local affairs and could pass on their positions hereditarily. The tusi system was the nex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administrative units. It began under the Yuan and was fully articulated under the Ming—complete with regulations governing rank, promotion, demo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re were basically three categories of officials within the system. [6] P39

译文：

为了妥善管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汉人通常采取本土治理（也称间接治理）方式。具体来讲，战略意义或经济价值更大的地区由汉人官员来管理，西南边疆地区则由土司或地方头目负责。虽然在历史上这一政策不是一成不变，期间存在汉人镇压和直接统治，但总体上来讲，土司制度表明中央政府希望花费最小的人力物力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政策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封建政权笃信的统治观念，即“以夷制夷”。土司制度源于先前朝代的“放手”（羁縻）政策。这一政策的理念是，宽泛管理，不对边远地区的头目强加意志，以免造成关系割裂，局面不可收拾。汉代，边疆头目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为随意，到了唐代，这一关系制度化、正规化了。渐渐地，在羁縻政策影响下，道、府、卫戍区得以建立起来了，这些新行政单位的头目，一般来讲非汉人，在地方事务方面有了一定的权限，且可让其权位世袭。在这些机构建立之后，就出现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始于元代，在明代得到了全面发展，有完整的级别、提拔、贬职、奖赏、惩罚规章制度，土司基本上分为三类。

美国学者 Jenks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总体持同情的态度。这点表现在其表述“战略意义或经济价值更大的地区由汉人官员来管理，西南边疆地区则由土司或地方头目负责”“土司制度表明中央政府希望花费最小的人力物力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夷制夷”上，似乎将少数民族置于弱势群体或受压制的位置来看待。作为学者，Jenks 的话语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了学术群体的声音，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是“机构话语”的体现，其意见会影响学术社区（此处为民族问题学术社区）乃至其他对民族问题感兴趣的普通百姓。在这里，学者为话语权势来源，对于话语的主宰、使用权、社会认知、话语结构具有重要影响。^{[7] [8]}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经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了 Jenks 的观点有些地方值得斟酌。据中国学者研究，“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③。

³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fnL-YkE14xms-1XC6CNp8g5IufkWAoWYTWXEF6ijbpL7csliHf9-XViLKc>。

由此看来，在将上文翻译成汉语时（读者自然主要为我国读者或全球其他汉语读者），有必要添加相关注释，消除历史距离感，让读者认识到土司制度是个历史产物，在人格、情感、逻辑三修辞元素上实现高效，构建译者与读者的对话性，在评价系统中有意识加入译者的介入，提升正面反应这一鉴赏子体系的效度，平衡情感的强弱，进而体现下面的语篇意识形态：历史事实+ 维护中国正面形象+ 自我批评。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但又要说明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土司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主权有积极作用，不足之处可能是过于强调少数民族上层社会阶层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下层社会的利益。此外，根据 Jenks 的表述，上述译文也缺乏对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关系的进一步说明，好像两制度等同一样。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了其差异：宋朝的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各羁縻州与宋王朝实际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土司制度与羁縻州政策的区别在于由松散的统治变为严格的控制，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这种意义上看，Jenks 的研究还不够严谨，如果在汉语译文中加上注释，则可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将“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ng）加以体现，让国内外汉语译文读者更为客观地了解土司制度的由来^{[9] P49 - 52, [10] P16}。对翻译评价标准进行了研究，参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提出可从“意义+ 情感”角度分析译文的质量，这点与“工具性翻译”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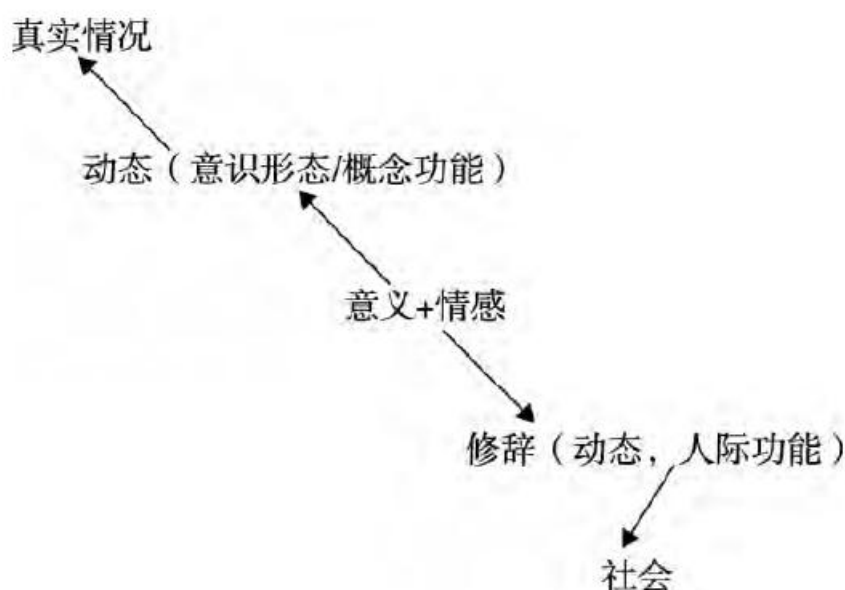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质量评价

图1 说明，翻译质量好坏与读者的反应密切相关，意识形态、修辞的运用与意义、情感如何融合不可分割。Matthew^[11] 讨论了中世纪英文小说 Ywain and Gawain 原文(法语)的翻译与意识形态(ideology)问题，认为涉及美学(艺术品)与译本(纯翻译)对立体，与互文性、历史阶段特殊体裁(genre)有关，也与叙事结构有关。由此可见，翻译的语篇意识形态是一个多维的、抽象与具体、总体与个体、策略与技巧相结合的理念。翻译 Jenks 的土司制度研究如能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加上适当的注释，可使译文更好体现翻译的距离、语篇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修辞三元素效度、评价功能等。

（二）贵州以前的形象

Jenks 的研究以贵州苗民为对象。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苗民”的称呼不局限于贵州的苗族，还包括了其他少数民族甚至部分汉族，“苗民”成了一个贬低、侮辱性称呼，参与反抗封建王朝的当地民众皆被冠以“苗民”。我们看看下面的原文以及译文：

Guizhou was also a frontier region in the sense that it was still on the margin of settled or developed territory. Governmental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controls were far weaker than they were in the more settled parts of the empire. The law was applied less stringently, and there was more tolerance of dissidence and heterodoxy, while cultural resources were severely circumscribed. Guizhou had long been a dumping ground for exiled criminals, and those who migrated there voluntarily and stayed on tended to be independent-minded. In short,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take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he consistently high level of recorded conflict was, in part, a reflection of that fact. [12] P5

译文:

由于贵州仍然人烟较少、欠发达,所以它也是个边陲地区。这里,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管控要弱于人口稠密、发达地区。此外,法律管辖严明程度较低,尽管文化资源受到严重限制,但允许不同信仰、意见出现。长期以来,贵州是流放犯人之地,那些自愿迁徙到贵州且居住下来的人多为思想独立人士。总之,人们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对待法律,因此历史上记录的发生在贵州的冲突一直较高,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现实。

上述译文是按照原文描述进行翻译的,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语篇意识形态来讲,强调贵州的负面性,似乎是“客观”的描述:流放犯人之地、思想独立人士居住之地、我行我素地对待法律。从评价角度来看,“管控较弱”“人烟较少”“欠发达”等词语似乎传递的是古代统治者的声音,缺乏与当时大众百姓的对话,有损普通中国人的形象(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能当作“他者”加以对待)。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 Jenks 的论述有失偏颇:清朝康乾时期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族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④

在清朝前期,仅见于史籍记载的比较著名的起义就达五六十起之多。苗民起义爆发于贵州和湖南西部,那里是苗族聚居的地区。^⑤为了能够缩短读者与历史事实的政治、文化与心理距离,建议采取巴赫金的对话,以“信”为最重要的翻译原则,以“达”作为表达的目的,“雅”则居于一般的位置。这里需结合多重声音,以还原历史事实,突显“复调”。陈历明^[13]主张译者必须重新阐释,更新译本,让新的译本在新的时空与新的读者相遇、对话,从而开始一轮一轮新的阐释、对话的循环,这也是同时或先后出现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的主因。这里,我们主张采取增译的手段,对原文进行充实,突出译者的主体性、服务交际性翻译的目的。建议译文改为:

在明清时期贵州经济相对落后,汉人较少,少数民族(如苗族)较多。一般我们认为,这里的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管控要弱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汉族聚居区,但事实上这里民怨甚深。清朝康乾时期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族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加之长期以来,贵州是流放犯人之地,况且那些自愿迁徙到贵州且居住下来的人多为不满封建中央统治者。因此,历史上记录的发生在贵州的反抗与冲突一直较多,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现实。

经过这样的修改,我们拉近了读者与历史事实的距离,同时彰显了译者的政治意识、伦理道德等。

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 Newmark^{[14] P4}对译者、读者、文化、模式、源语作者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翻译存在动态机制(dynamics),详见图2:

⁴ ①② 资料来源: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9Qs7g8A91h0B6taSS0xtNJpTLfx_cKMvnaRNWR C3HEFXDQDQTNXPMeKqL6Z0pf-74ckhHI0rcceFKXpJq_froRmdT6jv8ybPw5T0ySnmU_48u2LVUYguE8y95bTFmlB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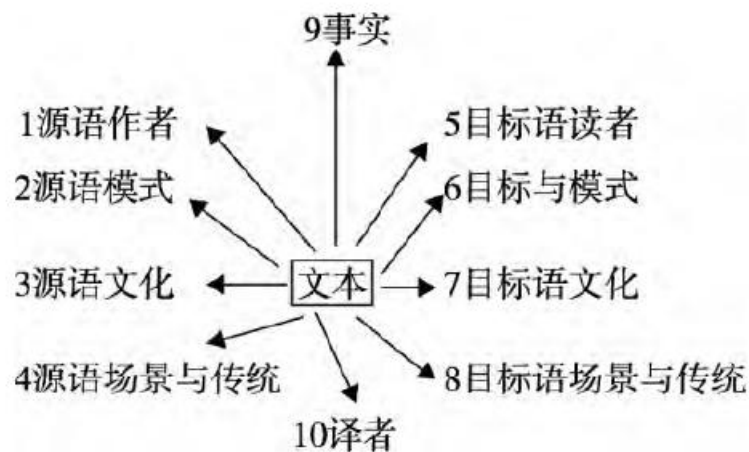


图2 翻译的动态机制

翻译的动态机制以文本为中心，涉及 10 个因素，在翻译产品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影响，最终形成符合译者目的、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目标语文本。这一模式与模因论所提到的各种超级模因、具体操作模因不谋而合，可以为类似的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提供参考。

（三）关于对苗族与苗民的定义

上文提及，苗族在封建时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而引发了反抗。Jenks 在研究“苗民”起义时也提及到这些，下为原文与译文：

Modern authors have argued that the “Miao” rebellion was so named because the Miao participated in every rebel group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insurgency: the Miao served as 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 of the rebellion, and therefore it bears their name. This questionable argument seems to be driven b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term “Miao rebellion” (“Miaoluan”) was first us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hile the insurrection was still in progress. The designation served a useful function as a convenient, succinct way of describing an ethnically complex rebellion, for “Miao” in Chinese could refer to either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or to southern barbarians in general. More important, the term provided a scapegoat on whom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bellion could be fixed. The Qing authorities were well aware that the Han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rebellion. By labeling it a “Miao” rebellion i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the authorities made sure that the stigma of having rebelled and caused vast destruction and misery was attached squarely to the Miao and not to the Han.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the onus was removed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its role in precipitating the turmoil. The Miao, after all, wer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a barbaric people who could be expected to rebel gratuitously, no matter how well governed the empire might be. [15] P4

译文：

现代研究者认为，由于苗族在反叛过程中加入了各暴动群体，因此有了“苗”乱之名，换句话说，苗族是暴动的基础，故而得名。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似乎有政治考量。“苗族暴动”（“苗乱”）这一说法首先出现在清代政府，那时苗族反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一名称显得实用，可方便、简洁地描述民族成分复杂的暴动，在汉语中，“苗”可指某一特定民族，也可泛指南方野蛮民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污名可为暴动责任找个替罪羊。清朝政府非常清楚，汉族在暴动中才是主

要角色的扮演者。在官方史料记载中冠以“苗”乱之名，当局者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暴乱以及造成巨大破坏、痛苦的污名可以大胆地扣在苗族头上，而不是汉族头上。同时，政府也可推诿责任，声称自己不是反叛的始作俑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苗族毕竟是个野蛮民族，无论国家管理得多好，他们都可能平白无故地搞所谓的暴动。

翻译家 Baker^{[16] P91} 提及博弈论在翻译中的使用，认为翻译可以像数学、经济学的竞争一样，有赢家、输家，甚至为零和游戏 (zero sum game)。这一说法对于将外国学者的贵州文化研究翻译成中文特别有启示。根据这一理论，翻译包含界定性 (definitional) 内容，即构成性 (formative) 内容，也包括选择性 (selective) 内容。前者必须翻译，后者不一定翻译。我们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包含的历史事实和正确的观点为界定性内容，而错误的描述与观点为选择性内容，可以不翻译，如有翻译，需加注说明。通过与中国民族学研究者交流，发现 Jenks 的关于苗族与苗民的研究正确，因此按原文进行翻译，未添加注释或修改表述方式。这一模式说明译者与原作者的主体性一致，也说明译者与原作者之间没有文化、政治等距离，评价系统基本吻合，译文与原文的修辞三元素没有差异，原文读者、译文读者同等对待。同样的模式适用于下列研究——“生苗”与“熟苗”之分、苗族与跨境苗族。如此看来，翻译模式具有可复制性、推广性、模因性 (基因传承性) 等特点。

(四) 关于“生苗”与“熟苗”

The term “raw Miao” used by Yan Ruyi requires com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ao mentioned earlier (i. e. , according to such criteria as clothing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used another standard for differentiation. It was a very old one that was also applied to steppe nomads, Taiwan aborigines, and other “barbarians”. The Miao were categorized as either raw (sheng Miao) or cooked (shu Miao). By definition, the former lived in remote areas, were beyond the pa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paid taxes and did labor service, and had absorbed some m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In other words, one group was almost totally unassimilated, while the other group was assimila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e terms “cooked” and “raw”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way the Han looked upon the Miao and other minorities. Both are essentially pejorative, and as such they provide an important insight into Han attitudes toward minorities. ^{[17] P34 - 35}

译文：

严如煜使用过“生苗”这一术语，这里值得一提。我们前面提过，苗族的分类传统上依据服装和身体特征等标准，但在中国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标准。这一分类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曾经在对草原游牧民族、台湾世居民族和其他“夷人”分类时也采用过此标准。依据此标准，苗族可分为“生苗”或“熟苗”。我们不妨将前者界定为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苗民，他们位于中国文明和政治管理的边缘地带，缴纳税收，从事苦力活，吸收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换言之，“生苗”没有被汉族文化同化，而“熟苗”不同程度上被汉族文化同化了。“生苗”与“熟苗”之分反映了汉族对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看法。两种说法本质上是贬义的，正因为如此，可一定程度揭示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五) 关于苗族与跨境苗族

How do the Hmong fit into broade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The people with whom I worked are a subgroup of Hmong, or Miao /Yao speaking people, an ethnic minority who have lived on the fringes of powerful states, primarily China, for centuries, but where they originated and much of their subsequent history i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Miao in China did not have a writing system of their own, so scholars have had to rely on Chinese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reconstruct the Hmong or Miao past. The Shujing (Book of Documents) places the Miao in China in the third century B. C. Although the Yao documented in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records on them become rare afterwards, with only a few brief mention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til they

reemerge in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has led to confusion as to their whereabouts during the intervening centuries. The Hmong themselves, along with some scholars, postulate that the Miao /Hmong originated in Mongolia, migrating to Siberia and then to China. Others, including linguists, refute some of this and postulate that the Miao /Hmong originated in southern China.

The ethnonym Miao, and subsequently Meo in Laos and Thailand, also has been a source of confusion, and many explanations are given for the name. Yang Dao, a Hmong scholar, has stated that the Miao is a Chinese term meaning “barbarian”, but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are called and who call themselves Miao. In the diaspora following the Vietnam War, Miao /Hmong hav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French Guyana, Canada, and Europe, and in these countries they call themselves Hmong. [18] Pxxiv — xxv

译文:

苗族如何融入到更广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氛围中? 我所交往的苗族是苗族的一个分支或苗/瑶语系民族, 多个世纪来生活在大国(主要是中国)的边陲, 但其来源地与历史流变确是有些神秘。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 因此学者们只得依赖相关的中国文献来重构苗族的历史。《书经》(又名《尚书》)认为中国苗族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在周朝、秦朝也有关于苗族的记录, 但之后类似的记录偏少, 唐、宋期间偶尔提及苗族, 在元、明期间官方文件中再次记录了苗族的相关情况。正因为如此, 人们不禁对中间空隙时间苗族的情况感到迷惑。苗族本身, 还有一些学者, 认为苗族起源于蒙古, 迁徙至西伯利亚, 之后迁徙到中国。其他人, 包括语言学家, 不是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认为苗族起源于中国南方。

苗族在中国、老挝、泰国称呼有所不同, 这也造成了一定的认知混淆, 许多学者对苗族的称号给予了解释。苗族学者杨道指出, 在汉语中“苗”是一个轻蔑的称呼, 意味着“野蛮”, 然而在中国仍然有许多人称作苗族或自称苗族。在越南战争后的大迁徙中, 部分苗族迁徙到美国、澳大利亚、法属圭亚那、加拿大和欧洲, 在这些国家他们自称为“蒙人”(苗族)。

四、结语

翻译是个综合性工程。在翻译过程中, 要考虑译者与原作者的距离(历史、文化、政治、审美等), 也要考虑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在文本信息认知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还不能忽略译文在影响其读者态度方面的作用, 因此译者需在介入、级差调节上下功夫, 在翻译策略与技巧等方面可采用加注、改写、编辑等。这样, 译文可为语篇意识形态服务, 在基于贵州本土文化的英译汉实践中体现“历史事实+ 维护中国正面形象+ 自我批评”这一语篇意识形态。西方学者 Roberts^[19]在将老子的著作《道德经》翻译成英文时, 采用了“介绍+ 内容翻译+ 评注”的翻译模式^⑤。“介绍”部分主要就该书文学与政治意识、标题、文

⁵ ① 《道德经》第一章中文原文以及 Moss Roberts “翻译+ 评论”对照:

老子:「道德经」: 第一章

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 常有, 欲以观其微。

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STANZA1

1. The Way as “way” bespeaks no common lasting Way,
2. The name as “name” no common lasting name.
3. Absent is the name for sky and land’s first life,
4. Present for the mother of all ten thousand things.

本、孔子与老子比较、老子时代的中国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继承进行了介绍，还介绍了“道”“德”等关键术语的含义。“评论”部分就各节英译中的内容、启示、哲理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修辞三元素、评价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拉近西方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我们认为，该模式就是我们提倡的“翻译距离视阈下的贵州本土文化英译汉模式”，具有可复制性、传承性、模因性。

参考文献:

- [1] 孙艺风. 翻译的距离 [J]. 中国翻译, 2013, (6) .
- [2] 肖唐金, 范允龙. 语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汉译英实践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2, (6) .
- [3] Heavey, K. Aphra Behn's Oenone to Paris: Ovidian Paraphrase by Women Writers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Vol. 23, Part 3, Autumn, 2014.
- [4]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1.
- [5] Slingerland, E. Confucius Analects [M]. Indianapolis/Cambridg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2003.
- [6] [12] [15] [17] Jenks, R. D.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Guizhou—The “Miao” Rebellion 1854 — 1873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
5. Desire ever — absent:
 6. Behold the seed germs of all things;
 7. Desire ever — present:
 8. Behold their every finite course.
 9. Forth together come the two
 10. As one and the same
 11. But differ in name.
 12. As one, a dark recess
 13. That probed recedes
 14. Past that portal whence
 15. The milling seed germs teem.

COMMENT Laozi opens with a creation myth. Dao, a single mother, source of all life, is juxtaposed to its creation,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Measured against Dao's fecundity, what ancestor, what male dynastic founder, can compare? Sky and land (tiandi) themselves are an intermediate creation, serving the Way as a framework that imparts form and name, and thus duality, on all things as they are produced. The ten thousand move between two poles: negation and existence, unity and division,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1 The Way describes a recurring circular or continuous s — shaped process that must return to its starting point before beginning again: “ [A]ll living forms . . . go round home again” (stanza 14) ; “ [t] he Way moves on by contra — motion” (stanza 40) .

-
- [7]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3, (2) .
- [8] 肖唐金. 从权势到亲和: 机构话语的文学性转变 [J] . 当代文坛, 2012, (1) .
- [9] Nord, C.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ranslation [A] . In Ann Trosborg(ed.) 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 [C] .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 [10] Munday J.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 [M] .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8.
- [11] Matthew D.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Ywain and Gawain [J] . Neophilologus, 1992, (76) .
- [13] 陈历明. 翻译: 复调的文化对话 [N]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4—26.
- [14]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 London: Pearson, 1988.
- [16] Baker, 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18] Symonds, P. V. Gender and the Cycle of Life: Calling in the Soul in a Hmong Village [M] .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 [19] Roberts, M. Laozi: Dao De Jing—The Book Of The Way [M] . Berk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